近日，一条有关“白领新标准”的微博，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按照这一标准，能够称得上白领的，不仅要月薪2万元以上的收入标准，还要有房有车有闲有品，有独特的娱乐方式，有钟爱的时尚品牌，众多网友表示自己又拖后腿。（5月1日《广州日报》）

白领新标准 缘何引发热烈讨论？

“白领新标准”不独今年才有。比如去年年初就有一份“2012中国新白领标准”出笼，内容大致与今年相同。官方也有具体的数字，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有具体的月收入线：上海为5350元；北京为5000元；杭州为4980元；广州为4750元；南京为3780元……当然了，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些数据显然是要提高的。另外，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在《醋溜族》中这样定义过白领：年轻、不甘寂寞，在鳞次栉比的水泥楼群间，追逐金钱、爱情和流行，尽可能为自己而活。当然，这些都只具备参考意义。

现实的情况下，很多让人羡慕的“现任白领”们，也在大叹“伤不起”，因为当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放在高企的生活成本下，特别是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下，巨大的压力感就会涌上心头。难怪有白领自嘲道：“一穷二白，白领真白。”这其实也可视为是当代白领的焦虑。

那么，对“白领的焦虑”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呢？笔者以为，白领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部分，是椭圆形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如果连白领都为生活而焦虑，收入低于白领阶层的人们，又该怎么办呢？一句话，白领普遍比较烦，说明白领们大多过得不快乐，更说明现实下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不高。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警惕。

当然，对“白领的焦虑”，我们也要冷静看待。毕竟，白领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是否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而不仅仅是“工资白领”。想到了印第安人的故事：一个考古队请印第安人当向导，辛苦跋涉3天后，印第安人说什么也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了。他们要求原地休息，并严肃地说：一定要休息一天，因为他们匆匆忙忙地赶了3天的路，他们的灵魂一定赶不上他们的脚步了，所以有必要停下来，等待他们的灵魂追赶上来。这个故事饱含着丰厚的心理营养和生存哲学，财富并不是最主要的，安宁和幸福才是最永恒的。在快马加鞭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需要精神财富的滋养。

而对于决策者来说，“白领新标准”的价值，还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坐标，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白领级”的收入水平；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让人们清晰地看出“白领级”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中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如何改变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防止社会资源过于集中，缩小贫富差距，当是值得各级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的一个严峻问题。唯此，白领称谓才能名副其实，“橄榄形社会”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袁浩**

干部应在“俯身抬头”中转作风

哈尔滨市委近日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解决问题时要主动“降两级”，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在谋发展战略时，要把自己“升两级”，立足长远思考问题，在“俯身”、“抬头”中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哈尔滨市委的这一提法，主要针对的是部分党员干部“站位不准”问题。主要表现在：面对群众、面对问题时习惯当“甩手掌柜”，把困难抛给下级；作为专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往往情况不明、底数不清、数字不准，甚至爱用讲解员看似正规的情况介绍，替代有针对性的工作汇报；在谋发展时就事论事，就题答题，成了“近视眼”，把口号当战略，规划缺乏全局性、连续性，甚至抛不开部门或小团体利益，各自为战、以邻为壑。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指出，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综观近年来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暴露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与群众需求背道而驰，与事业需要相差甚远。这种作风不根除，将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甚至阻碍“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干部作风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发展环境。哈尔滨市委“降两级”干工作的倡议，是一剂克服形式主义的良方。按照哈尔滨市委要求，全市行政执法部门正在走出“重罚轻管少服务”的局面，执法理念和服务方式正发生着明显转变。市公安局主动邀请企业代表“上门找茬”，倾听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并现场提出整改措施；市工商局提出执法人员“出门要请示、进门要登记、检查要审批、处罚要适当”；市国土局提出对群众“不能说不行”等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得到了广泛好评。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代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一项错误决策对事业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按照哈尔滨市委要求，市县乡三级干部既要“俯下身”又要“抬起头”。乡长要有县长的眼界，县长要有市长的思维，“升两级”谋战略，杜绝规划的短期性、部门性、局限性。这无疑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更高要求，需要决策者在思想上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在行动上告别“文案调研”、“听汇报拍板”等官僚主义作风，多学、慎思、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科学决策。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只有更多的党员干部在“俯身”“抬头”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真正哈得下腰、躬下身子去干一番事业，增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党才能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中国梦”才会加速实现。 **新文**

别让“无机会”成为青年逐梦的绊脚石

对于青年而言，梦想或许会因时代变迁而不同，但每一位青年的逐梦路，都离不开公平阳光的照耀。“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更提醒着当下社会，别让青年的梦想在一些不公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青年人富有活力，充满梦想，渴望成功。另一方面，面临升学、就业等激烈竞争的青年群体又相对弱势。他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争取更好的发展平台，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萝卜招聘”、“拼爹”以及涌动在各个层面的“潜规则”，让不少人动摇了“爱拼才会赢”的信心。

有社会学家提出了“无机会群体”概念，这些人往往因为资源配置或制度方面的不公，被剥夺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如果本应敢闯敢拼的青年人沦为“无机会人群”，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将大打折扣，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将受到影响。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应该保证每一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在充满机遇、通过奋斗能够实现愿望的社会，青年的逐梦道路才能频现精彩。

不让“无机会”成为青年逐梦的绊脚石，离不开规则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一些制度执行过程中被人为走样儿，导致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如果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天花板”难以突破，不但会使部分青年梦碎，民族梦、国家梦恐怕也难以实现。规则制度的完善，应广聚民意、广纳民智，避免不必要的干预，让权力运行得公开透明。

不让“无机会”成为青年逐梦的绊脚石，离不开他们对现实的广泛参与。青年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适应。如果能让青年参与制度制定的相关环节，为他们提供更多发声渠道，社会资源的分配或许能更具针对性，更符合不同时代下青年的发展需要。只有合适的土壤，五彩斑斓的梦想才能绽放出绚烂花朵。

当然，避开逐梦路上的绊脚石，也离不开青年人自身的努力。一味抱怨，最终只能被社会抛弃。任何社会环境下，都有一批不服输、不认命的人脱颖而出。青年人既要有贴近现实的小梦想，还要有能够预期的大梦想。每一个出彩的青年梦，将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黄小希**

一张“空”纸？

中国正迎来新一轮城镇化发展浪潮，户口问题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最近表示，户籍政策不单单是一个户口性质的问题，它包含着就业、社保、住房及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保障。

甘肃省陇西县首阳镇党委书记韩德说，上世纪90年代，很多农民想方设法要转为城镇户口，每年约有上千名农民提出申请，但指标只有500个左右；而如今，这种需求明显下降，去年全镇约10户提出申请。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户口的观念还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将引发人们对城镇化进程更进一步的思考。

“是的，我想进城，但是我必须能养活自己，而且要有一套能住在城里的房子。”农民何成来说：“只换一个城镇户口本是没用的。”

焦海洋/图

推出“一票制”之后的第20天，凤凰迎来了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五一“小长假”。往年，“小长假”首日凤凰古城游客“爆棚”，商户生意尤其红火。而今年则显得有些门庭冷落，游客减至去年六成左右。凤凰古城内的客栈老板无奈地表示：“这个五一算是毁了。”（5月1日《京华时报》）

五一“有点冷”的凤凰是景区改革的镜子

五一“小长假”，凤凰古城“有点冷”的现实，并不算出人意料。事实上，这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只是验证了人们此前的担忧。同时，它也传递出两大需要我们铭记的信号。

一是“有点冷”的现实驳斥了此前凤凰县相关官员“游客不在乎门票多少”的言论，传递出中国游客对景区价格依然敏感的信号。近些年来，我们国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人们的收入水平尚没有达到“不在乎”的程度。别把中国游客想得太有钱，想得太过钱多、人傻！

二是六成游客说明四成没来，四成人用脚投了票，传递出违背民意必然受到民众的唾弃的信号。凤凰古城“一票制”自其出台到实施，民意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相关管理部门无视这种民众呼声，一意孤行，结果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或许，凤凰古城的一些“关卡”对游客不加阻拦的现实，并不能证明媒体所说的“购票令已经名存实亡”，但凤凰能否挺得过新规的“阵痛”，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收费不合道理、不合国情民意是凤凰古城“有点冷”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对如今一些正在改革和酝酿改革的景区来说，无疑是一个反面典型，至少是一面镜子。面对凤凰“一票制”改革，全国各大景区有必要思量，到底该如何收费，是尊重民众意愿，给民众选择权，还是圈地收费搞“一票制”，逼民众用脚投票？

至少，景区改革和收费，有必要明确两大现实：一是中国人收入水平并不高，没有过多钱用于旅游；二是民意不可违背，执政如此，景区管理和收费亦如此。 **刘鹏**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引起不小风波。近日，施一公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5月2日《新京报》）

少些院士墙外开花的遗憾

施一公入选美国双院士，让许多人想起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只不过这里的“降”，要改成“择”。在被问及施一公之前落选中科院院士时，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高级媒体官员称，“这个问题得问中国科学院”。在一些人看来，话里有话，这是对中国院士评选的冷嘲热讽。我倒觉得，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复杂，这可能只是一句大实话。

施一公能够墙外开花，入选美国双院士，体现了他的学术成就，说明“金子总会闪光的”。只要抱着公允之心，任何人都会给予祝贺。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施一公此前没有能够入选中科院院士，就一定是因为潜规则，甚至演绎成：人家靠学术成就，咱靠人际关系——这一逻辑推理，说服力并不是很强。

这是因为，选院士不是评职称，并没有一个明显绝对的标准。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很难量化，这也决定了，院士评选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甚至差错性。并不排除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某人的水平很高，但阴差阳错并没有被选上；某人水平不怎么样，却浑水摸鱼一路过关。而且，不同评选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一定差异性。那种简单地认为，当选了美国院士而落选中国院士，就一定有内幕有交易的观点，是在不同的院士评选之间制造差异。

不宜对施一公墙外开花过度演绎、轻易逼宫，但积极的反思还是必要的。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科研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博士不搞科研，宁可去教中学；院士墙内不通，只能当外国院士……舆论的焦虑不安，指向的正是中国科研领域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行政化、官僚化、论资排辈、近亲繁殖。2010年，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在《科学》杂志上联合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今天中国的科研，存不存在施一公和饶毅当初指出的问题？中国的院士评选，存不存在舆论一直怀疑的不公不平问题？最终又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墙外开花未必就是墙内不行，但这终究是一种遗憾。如果说是因为拉关系、走后门、行政化、官僚化、论资排辈、近亲繁殖，而造成的墙内开不了花，更是一个悲剧。这些科研乱象，会害死人才、害死科技、害死创新、害死未来。当前，有必要对中国科研机制以及院士评选机制，来一个全面的讨论：中国科研以及院士评选到底存不存在不公以及人为操纵的问题？

少些院士墙外开花的遗憾，墙内墙外一起开花，更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充满着潜规则，存在着大量问题，而又失去改革勇气的科研领域，是没有希望的，也支撑不起中国梦。 **毛建国**

用行动找回对“红十字”的信任

“红十字”是什么？灾难中，它是救死扶伤的天使。饥荒里，它是起死回生的希望。战场上，子弹都为红十字会旗让路，因为它代表无条件的同情、博爱、奉献和拯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圣洁的组织，这些天来却要承受无休止的怀疑和质问。仍在持续的芦山地震救援中，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全球最大的人道组织，先是在募集善款时遭遇了众多网民的质疑，募款一度落在其他民间组织的后头，此后又一次次为“虚开发票”、“收取买路钱”、“工作人员戴名表”等谣言所扰，陷入百口莫辩的困境。

平心而论，中国红十字会在这次地震救援中的表现，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台湾红十字会的同行评价，“现场看看就知道，他们是没吃没穿没睡没厕所，更没私心”。连它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像红十字会一样掌控着如此多的资源，有着如此完善、深入的组织形态，它的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在尽力为灾区作贡献。

不过，由此就断言红十字会已经走出信任危机，显然为时过早。尽管网站捐款平台上，连那些明显带着嘲讽意味的“一分钱捐赠”都恭恭敬敬记录在案，尽管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宣布“将于5月重查郭美美案”，尽管迅速贴出了5年前百名艺术家的捐款建设项目分布表，并为沟通服务的欠缺向捐赠者道歉，但这些补救措施，一时之间显然难以洗刷掉几年来一连串事件所形成的负面印象。重建公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便抚平，再也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希望红会会懂”。

红会当然懂。这个几十年计划经济时期硕果仅存的“非政府组织”，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面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趋势，它的转型，一方面要与多年形成的垄断习惯作斗争，迅速提高组织管理能力，让数以亿计的慈善资金和物资发挥最大效益；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商业利益对慈善机构的诱惑与侵蚀，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质询和批评。与此同时，它还要理顺与政府管理部门、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公民的关系，建立起协调共赢的体制机制。这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难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

正因如此，不能指望通过某一次或几次给力的救灾行动，就令公众刮目相看、既往不咎。

回首中国红十字会109年历史，在公众记忆里，它曾经是负面新闻最少的公益组织。然而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任何机构团体都不会对利益交换、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只有接种好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疫苗，大刀阔斧推进慈善改革，才能寻回失去的世界，重获社会的信任。

在这一点上，红会负责人的态度值得肯定——“老百姓的任何情绪，都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没有更多别的办法，只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将红会的工作装在玻璃盒里，一举一动都能让公众看到。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杨健**

中国式“挪假”算不算真休假？

靠周末加班加点“挪”出来的五一小长假，过得有点狼狈。网民吐槽休假方式的背后，折射了人们对休息权的迫切期待，各种“挪假”难以满足劳动者的休假需求，还是要多来点真休假。

根据2013年假日安排，元旦后连上8天班，春节后连上7天班，全年7个节假日共放假29天，剔除周六、周日，假期只剩11天。也难怪很多人吐槽假期太“假”太零散。

当然，每个假日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安排，但现在的休假方案显然不够完美，仍然需要根据人们新的诉求制订更科学的方案。虽然通过拼凑挪用等方式让假期变“长”了，但也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节奏。

休息与劳动相生相依，没有休息的劳动难以为继。保障劳动者休息的权利，也是实现体面劳动、有尊严劳动的重要一部分。按照官方数据，中国人公共假期每年已有115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喜人的数字看似与国际接轨，落实效果却并不理想。试问：有多少人悠闲自得地休满假了？带薪休假的“幸运儿”又有多少？

面对百姓越来越强烈的休假需求，相关部门也需要认真考虑民意，休假方案的调整和完善已迫在眉睫。经过了征求民意、科学论证，对假日方案进行适时修正，不能算是折腾。当然，从长远看来，还要真正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企业要摒弃“加班为荣”的文化，监管部门要真正有所作为，只有企业自觉，政府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劳动者才有底气给自己放假，假期才能过出“暇”的味道。

尊重劳动者的休假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会休息才会工作，希望我们的假日安排更科学，更希望劳动者的休假权真正有保障。 **张丽娜 杨玉华**

产业的维护需要宽容

央视报道了五一假期里中国人赴韩国整形的新闻，这可能是公开报道韩国整形成为风尚的最正式的一次吧。真的是韩国整形技术比中国的强吗？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能在观众中形成如此印象，首先不能忽视韩剧这种电视文化的无形引导，其次则是，韩国对整个整形行业的维护。

韩国的整形业也是良莠并存的，特别是对远道而来、环境和语言都很陌生的中国人，很可能就找到一个伪劣产品，一个冒牌医生，整形的失败肯定不胜枚举，但是，这种负性事件并没有影响国人对韩国整形的印象，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者，无论是韩剧还是韩星，再者就是韩国本身对这一产业的维护很在意，虽然这种掩盖绝不足取，但至少提示我们，对一个产业的维护是需要在严格管理前提下适度宽容的。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过众多专家的会诊后决定对梁启超进行肾脏切除，但由于值班护士标明手术位置时疏忽大意，错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当成坏肾割掉。对此，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通过媒体向协和医院口诛笔伐。

当时西医刚传入中国不久，很多人持观望态度。梁启超认为维护西医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不但没有状告协和医院，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还支撑着病体亲自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开脱：“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如果没有梁启超当时的宽容，西医进入中国的时间很可能被推后很多年。

由此想到，之前中国传统的黄酒因为含致癌物（EC）被在香港下架一事，后来查明，其中的致癌物并非人工添加，而是发酵中自然存在的，不独黄酒，任何发酵食物都难以避免，其中欧盟水果白兰地的EC的要求小于0.4毫克/千克，法国与瑞士规定是小于1毫克/千克，而问题黄酒检出的EC含量为0.2至0.26毫克/千克，远低于这些欧盟规定……幸好这个有损黄酒传统行业的“虚惊”没有继续“发酵”，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黄酒也躲过一劫，但反观整个事情的发展，不乏追问，质疑，甚至还有看热闹的旁观心态，却缺少宽容和责任，而后者，小到民族品牌，大到传统文化，在它们的成长和延续中都是最不可或缺的。 **佟彤**